

试析 1976~1978 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李 研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91)

摘 要: 对外经济援助是中国政府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1978 年这一特殊时期,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方针、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总体而言, 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1976~1978; 对外经济; 援助

中图分类号: F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2003)02-0007-02

一、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对外经济援助看成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国际主义的援助。而“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 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 是多年来对外援助工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进入 70 年代, 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出现高潮。中国的外援数额急剧增大,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很高。1975 年 4 月 23 日, 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实际能力,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的支出。援助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多半以无偿形式提供, 今后将逐步增加双边贸易形式, 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1977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 对“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干扰和破坏援外工作的罪行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坚持援外八项原则, 积极稳妥, 保证重点, 兼顾全面, 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援外工作方针。在这次援外会议精神指导下, 各个部门抓紧落实。同年的 9 月 25 日, 中共中央转发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 报告对一系列具体事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指出: 今后如无特殊情况, 援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以不超过 4% 为宜。鉴于对外已答应的援款还有 174 亿元尚待交付, 近几年内, 应以履行已承担的义务为主, 每年对外新承担的援款

以控制在 10 亿元左右为宜, 这就为今后的外援工作提供了依据。同时期前后,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对外援助的文件, 包括《关于改进援外成套项目设计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援外项目筹建单位工作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项目定型设计工作的意见》《关于颁发援外人员生活待遇暂行规定的通知》等等, 这些文件对对外经济援助工作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此时, 中外关系中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同越南、阿尔巴尼亚两国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越南始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援助对象。但从 60 年代中期起, 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北部湾问题、中越陆地边界问题、旅越华侨问题、柬埔寨问题等方面, 中越两国开始出现分歧。尤其 1975 年越南统一后, 武装占领柬埔寨, 同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之后, 越南当局就把中国称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 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反华活动开始逐步升级, 大批华侨遭到迫害和驱赶, 煽动对中国的民族仇恨。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除了停止对越援助之外, 没有其他的选项。1978 年 5 月 12 日, 中国政府宣布撤消 21 个援越项目。5 月 30 日再撤消 51 项成套设备以及用于这些项目的援助款项。7 月 11 日、14 日、18 日, 在越南工作的 299 名中国专家分批回到北京。

与此相似,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国共产党也进行攻击, 在政治上加剧反华的同时, 又肆意诋毁中国的援助, 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 使阿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这样, 中国外交部被迫于 1978 年 7 月 7

日向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宣布：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停止支付对阿尔巴尼亚的援款，接回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经济和军事专家。

二、1976~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情况

在这一阶段，虽然中国缩小了对外援助的规模，但还是尽其所能，在成套设备、技术援助、提供贷款和援外专家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成套项目援助。援外成套项目，是指凡是由中国负责设计、派人组织或指导施工安装，并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建成后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工程项目。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经济技术工作，1976~1978年间主要项目有：1）农业援助。坦桑尼亚西南部贝亚省的姆巴拉利农场是中国援建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机械化农场。1977年建成投产，供应市场大米。坦桑尼亚政府称它为“第三世界合作的典范”。2）修建体育场。1977年11月15日，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出席中国援建的摩加迪沙体育场竣工仪式。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于步血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参加。3）修建公路。1978年6月18日，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出席中国援建的喀喇昆仑公路第二期工程竣工典礼，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参加。1978年8月1日，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和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中国援建的贝莱特温—布劳公路的移交仪式。

（二）技术援助。中国派遣专家帮助受援国掌握某个领域的技术。提供这种技术援助，对于帮助受援国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解决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积极作用。1976年，中国派出水利和水稻专家，帮助乌干达在多禾地区的沼泽地开发稻区，发展水稻生产。1977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养鱼专家帮助改建马扎夫朗养鱼中心。1975~1977年，中国派出专家帮助坦桑尼亚进行煤炭地质勘探，探明储量4900多万吨。1977年中国卫生部门派出专家为毛里塔尼亚进行全面的预防医学研究。1977年，中国派出生物制品专家组帮助坦桑尼亚进行疫苗生产。

（三）提供贷款。1976年1月28日，中国政府向斯里兰卡政府提供现汇贷款的协定在科伦坡签订。1977年10月28日，中国政府同老挝在万象签订协定，中国向老挝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同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向牙买加政府提供商品贷款的协定在金斯敦签订。

（四）派出优秀援外人员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

出国人员的选派是援外工作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选派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过硬、身体健康的人员出国工作。1977年7月，对外经济联络部在烟台市召开了援外人员选审和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以便加强出国人员选审和管理教育工作。出国援外人员把受援国的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言传身教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同受援国人民平等相待、同甘共苦。

三、1976~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思考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交往中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它能增进中国人民同受援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精神援助固然需要，但经济援助是更重要的援助。在1976~1978年间，中国处于特殊的困难时期，本国的经济建设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的状况，即便这样，中国政府还是兼顾对外援助工作，保持对外援助工作的一贯性，这使得受援国非常感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许多国家的信任。

其次，它能加强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采取敌对政策，对中国封锁、禁运，发展中国家给中国以很大的支持，中国与他们的合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占了重要的位置。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中国人开始关注经济发展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与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对于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加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通过合作，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使中国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第三，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欢迎和称赞。中国政府对他国提供援助，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无控制它国的意图。中国提供援助的项目使受援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这些项目短期内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受援国纷纷称赞中国的援助是最重要的援助。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帮助受援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是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目的。为了减少受援国的经济负担，中国政府都是以长期无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延长贷款的偿还期限。中国提供的援助项目，都尽量考虑到受援国的实际需要和当（下转第10页）

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等。尽管它们的具体观点有出入，但也有一个共同倾向：注重客体，把客体看成一个自足体，这样有利于对客体的多侧面深入地观照，但同时它也割断了客体与主体（批评主体、创作主体）、环境以及外物的联系。很明显，场论的三个规律它都违背了，因而失于偏颇。

场论与原型批评。原型批评从神话学、人类化学、图腾与仪式、心理学等多角度对文本进行原型的寻找和阐释，以进行文艺学的研究。可以说，原型批评视野广阔，对于把握文学现象的文化形态和历史渊源，揭示文本的深层内容，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原型批评在具体实践中却认为创作是源于抽象的原型，而不是社会生活。而且原型批评以人类学、神话学代替文艺学，从而忽视了文艺学的自身特性和审美规律。正如道格拉斯·布什所说，其最大局限在于“它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审美价值的标准”，这等于取消了批评本身的存在。如果用场论的观点来看，原型批评没有把批评放到批评场中，甚至没有放到现时文化场中，只是在历时文化场外层对文艺进行远距离观照。但即使在这样的观照中，也还是从根本上忽视了主体，认为原型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看到主体实践的意义。

场论与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从接受者的角度对接受者和客体的辩证关系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它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接受者为中心的阅读理论，认为在文本的两个创造者（作家、读

者）中，读者是最重要的，占中心地位。这样就容易忽视文本中作家意图和倾向，可见其辩证法是不充分的。读者反批评更是走向极端，认为只有一个创造者，即读者，显然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沼。从场论观点看，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违背了双向激活律，同时由于它们在批评与外场之间是用文学史这条细线联系起来的，从而忽视了外场中非文学领域。

由以上比较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场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局部深入发展，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实践性的特点。它是一个全面的理论，可包容其他理论，同时纠正它们的偏颇。但是本理论又不是机械堆砌各因素，而是强调整体效应和有机性。

参考文献：

- [1] 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文学批评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2]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3] 畅广元，惠尚学，齐效斌，屈雅军．文艺学导论[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4] 刘庆福．马克思文艺论著选读[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5] 李西建．审美文化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上接第8页）地的可能条件，因地制宜，讲求实效。

第四，促进了中国国内生产技术的发展，锻炼了一批涉外技术人员。涉外技术人员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受援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汲取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

当然，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援助也存在着问题：

问题一，由于历史遗留因素的作用，当时对外援助规模有些庞大，援助数额也比较高，严重脱离了国内经济实力。尽管我国已经认识了这一点，在规模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针对当时的经济国力而言，还是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影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不利的影响。

问题二，援助工作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提出的口号也都是突出政治。对外援助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需要

的，从政治角度出发，势必给一些国家制造借口，说中国危险，对受援国有威胁，甚至反目成仇。

问题三，由于中国的国力现状，使援助工作不能有始有终。一些项目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不能实现当初的诺言，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客观上给受援国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不管怎样，应该看到对外援助始终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经济援助方式必然要适应形势的需要，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周恩来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多方面、多层次地拓展对外援助的道路，探索出适合中国自己的对外援助道路。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N]．人民日报，1963-8-9．
- [2]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